

论茅盾小说中的嘉兴文化地理因素

汪娟¹

(嘉兴学院文法学院, 浙江 嘉兴 300341)

【摘要】: 茅盾小说中的地理空间大多是以其故乡——嘉兴地区为观照, 嘉兴地区的文化地理环境从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各方面影响着他的创作。茅盾的作品带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政治倾向, 反映出作家创作与地理环境的互动; 嘉兴的经济地理环境为茅盾小说的经济描写提供了思维的角度, 他的小说充分展示了江南乡镇的经济文化; 在茅盾的小说创作中, 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 都是嘉兴文化地理的象征符号, 体现出他对嘉兴文化地理的高度认同感。

【关键词】: 文化地理 茅盾 小说 经济

【中图分类号】: I207. 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3079 (2018) 05-0093-05

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文化的地域性决定了文学的地域性。研究作家的性格、气质及其作品的风格, 都离不开对作家出生地文化环境的研究。“中国历代文学家分布重心的形成, 与京畿之地、富庶之我、文明之邦、开放之域等地域环境有密切关系。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分布有重要的制约作用, 政治、经济、文化这三者都以地理环境为依托。”^[1]纵观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地理环境, 多数作家都是以其故乡作为背景, 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茅盾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极具代表性的作家, 其作品中的故乡文化地理因素影响在以往的研究中似乎并不凸显, 但若从文化地理的视域观照茅盾作品, 可知茅盾小说中故乡的文化地理因素深深渗透于其创作思维中, 从而体现出文化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内在影响。

茅盾出生于浙江嘉兴桐乡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古老水乡——乌镇。从中国地理文化区划分而言, 嘉兴地区属吴越文化区, 毗邻上海, 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孕育了众多文化历史名人。茅盾作品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及相关的文化景观, 都有着其故乡的印记。茅盾作品大多是以他的生长地区为观照, 反映出故乡文化地理的鲜明特质, 蕴含了嘉兴地区的文化色彩, 可以说, 嘉兴文化地理对茅盾小说的塑造有着重要的作用。从茅盾的小说中可见嘉兴地区独特的政治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人文地理环境在其作品中留下的烙印, 而茅盾小说的文化品格、审美情趣无不凸显着嘉兴文化地理的质地。

一、茅盾小说创作中的社会政治环境

人类社会的政治活动与地理环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二者之间的互动, 构成了复杂的政治地理现象。“一方面, 地理环境为人类政治活动提供自然舞台, 天然地理基础与自然条件直接影响到人类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行为; 另一方面, 人类的政治活动又可以决定文化地理的分布状况, 并通过人文景观的建立改变原始的地理特征。”^[2]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左翼文学的开创者, 茅盾是社会剖析派小说的代表作家, 不可否认, 其作品中社会化、政治化的视野与嘉兴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自吴越战争而始, 嘉兴地区经历了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各种政治风云, 虽未曾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中心, 但其社会政治地理环境却有着重要意义。可以说, 茅盾一生都在政治与文学的交错中度过, 社会参与意识十分强烈。茅盾作品大多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 他以其特殊的方式反映出作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作者简介: 汪娟(1974—), 女, 山西临汾人, 嘉兴学院文法学院副教授, 文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嘉兴地区历来风气开化,较早受到民主、自由、文明的新风尚的影响。少年时期的茅盾就接受了新思想的教育,早期的思想中已经透露出对社会及人生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茅盾积极热情地关注和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进行文学创作。一方面,他将其对社会历史的观察与情感寄托在文学作品中,在文学中表达他心中实现社会变革的意愿,如王德威指出的:茅盾在除夕夜,“看到的不只是空荡荡、暗沉沉的街道与关门倒闭的商店,还有光彩耀眼的戏院门前聚集的大批人群——这个对比带出的是一个奇诡的末世景观,绝望与妄为、荒凉与颓废并存”,在茅盾回乡的航程中,他所看到的中国社会现状是“船正缓缓驶入深沉夜色——盲目与无力的领地”^[3];另一方面,他在文学之外仍深怀政治抱负。茅盾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一直热衷于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这种政治情怀已影响到他的小说创作,他认为五四高潮过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无产阶级的文学方向。

在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中,均以其故乡——嘉兴水乡的地理环境为背景,小说描写普通水乡农民老通宝一家的悲剧性遭遇,春蚕丰收却供过于求,种田丰收却米价剧跌,农民辛劳一年却得不到丝毫的成果。茅盾这些描写农村生产生活的小说深刻地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问题与社会状况,由于茅盾自身对故乡的社会现实认识较深,“故相较起来,他没有一般左派作家浅薄,也没有像他们一样陶醉于革命必胜的自我催眠调子中”^{[4][115]}。这些描述江南地区农民生活的作品,反映出茅盾故乡的地理环境生活不仅影响到其创作题材的选择,更使其有意识地运用政治化的社会价值标准去理解与描绘社会生活,这些小说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描写农民由自发反抗而走向革命的经典作品。捷克汉学家马立安·嘎利克认为:“茅盾是一位政治的、社会的作家。‘个人的区区小事’是不能吸引他的,只有那伟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才最使他激动不安。他的作品充满了时代精神,现实感极强。”^[6]茅盾是一个对社会具有很强使命感与责任感的作家,故乡嘉兴的社会地理环境使他对中国社会现实状况具有了更为敏锐的观察与独到的把握。

社会政治因素及党派意识已经渗透到茅盾的创作思维中,他的小说主题、人物形象与艺术风格都与社会环境息息相联。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写道:“茅盾无疑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革命作家,与同时期任何名家相比,毫不逊色。”^{[4][115]}20世纪30年代初期是中国社会锐变最戏剧性的时期,茅盾在这段时间的小说创作以乡间、城镇为空间背景,皆有故乡嘉兴的缩影。通过他的创作,茅盾提供了一个全面鸟瞰20世纪初期中国乡村社会的视角:农业相对于工业技术、衰亡相对于革命、过去相对于未来的,使读者认识到了社会、政治、经济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茅盾的小说以其丰富的内涵阐释了以嘉兴地区为样本的中国乡村城镇的社会政治环境。故乡嘉兴地区虽然很多时候在茅盾小说中被虚化,但原乡的影子始终在他的小说空间背景中出现。

浙江文人走向上海、落居上海是中国现代文学界相当普遍的现象,茅盾自1916年就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嘉兴地区与上海毗邻,无疑在区位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从故乡走向上海,上海的政治环境、文化环境为茅盾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乡间、市镇、都会三地的空间背景在茅盾的小说中呈现出互动的关系,充分地展现出社会环境的彼此参照,显示了茅盾对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深刻思考及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他对中国社会政治与现实的观察理解因此具有了深远的价值。

二、茅盾小说创作中的经济环境

不同的地域环境为人类提供不同的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经由人们的生产方式而形成不同类型的经济形态,经济发展的差异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因此,经济发展水平是制约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地区的经济环境对作家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影响从其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印记。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嘉兴区域具备优越的自然经济条件,土地肥沃,气候湿润,交通便利,是发展经济的风水宝地,“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是嘉兴经济文化地理的写照。嘉兴地区自古以来良好的经济基础造就了深厚的文化土壤,茅盾的成长地桐乡因“地处杭嘉湖平原,距上海仅半天的路程,稻桑兼作,颇得近代经济发展的风气之先”^[6]。

茅盾曾在其回忆录中描写过嘉兴桐乡乌镇:“我的故乡向来是一个鱼米之乡,清朝光绪年间,商业、手工业都很繁荣。……清朝乾隆年间,乌青两镇最为繁盛。市街店肆售同样物品都集于一处,市街即以是分类得名,例如衣帽街、柴米街之类,此在当时,只有省会或大的府城,才有此规模。就其区域之广,人口之多,商业和手工业繁荣之程度而言,仍然非一般县城所能及。”^[7]茅盾成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与嘉兴区域经济发达、商业氛围浓厚及自身接受过良好教育有直接关系,茅盾也认为:“人的思想乃受社会环境所支配,而社会环境乃受经济条件所支配。”^[8]茅盾生长在一个充满了商业氛围的家庭环境中,从小对商业的耳濡目染及生活体

验使他在创作小说时对社会经济的描写得心应手。

在茅盾的小说中,嘉兴经济对他最大的影响反映在他对故乡小商业环境的不断描写中。嘉兴作为江南小镇,桑蚕业既是其主要经济产业,也是农民的重要生产资料,在茅盾的许多小说中都或多或少地写到故乡的桑蚕业。茅盾对桑蚕业的熟谙在小说《春蚕》中表现得非常清晰。小说对蚕农从孵蚕前的准备到蚕的成长都有非常细致的描写,这些场景都是茅盾生活环境中耳熟能详的。在小说中最能反映当时社会经济现状的是对“茧贱伤农”的摹写:“原来那三十多里水路远的茧厂挑剔得非常苛刻:洋种茧一担只值三十五元,土种茧一担二十元,薄茧不要。老通宝他们的茧子虽然是上好的货色,却也被茧厂挑剩了那么一筐,不肯收买。”^[8]茅盾小说对桑蚕业的描写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末嘉兴地区的经济地理环境,这种农商结合的经济体系充斥着劳动者与剥削者的矛盾。茅盾在《我怎样写〈春蚕〉》中曾详细地介绍了“叶市”这样一种投机市场是如何操纵桑叶价格的,揭露了浙江杭嘉湖一带的茧行组织剥削蚕农的真相。茅盾在文中表明,自己虽不是农家弟子,但亲戚故旧都有做这行的。茅盾小说对桑蚕业的细腻描写代表着江南区域典型的乡镇经济文化,是20世纪20年代嘉兴经济地理环境的镜像,嘉兴经济地理环境一方面为茅盾小说的经济描写提供了书写与思维的角度,另一方面也揭示出经济地理环境与作家作品的重要关系。

嘉兴的经济地理环境是茅盾小说创作中经济视角的渊源,其身处嘉兴城镇的商业环境是不可忽略的。在茅盾小说中,社会背景都是江南城镇的工商业环境或是它的相邻上海区域,所涉及的人物也都是江南城镇的工商业者。“比如20年代的轮船公司老板王伯申(《霜叶红于二月花》),比如30年代的绸厂老板唐子嘉(《多角关系》),橡胶厂老板何耀先(《第一阶段的故事》),40年代的机器厂老板严仲平(《锻炼》),还包括林永清(《清明前后》)、阮仲平(《走上岗位》)等,这种地域商业传统的影响也是显然可见。”^[8]诸多的商人形象从性格特点及活动背景都带有茅盾故乡小商业经济文化的影子。其最有代表性的小商人形象莫过于《林家铺子》中的林老板,在他身上充分反映出嘉兴经济地理环境对商人的重要影响,林老板具有嘉兴商人的典型性格:精明勤劳,经营灵活,兢兢业业,奉公守法,胆小谨慎等。小说多次描写到林老板的这些特点,如:“于是林先生和他的店员就要大忙而特忙,异常敏感地伺察着这位未可知的顾客的眼光,瞧见他的眼光瞥见什么货物上,就赶快拿出那种货物请他考较。”^[9]⁹⁸小说中的林老板尽管苦苦挣扎、努力经营,但最后仍身处困境。茅盾将林老板作为一个乡镇小工商业者的普遍形象来描写,流露出对这一普遍形象的同情和悲悯,使读者能够切身感受到基于传统乡镇经济模式下,小工商业者们在当时所处时代与经济环境下的压迫感与悲凉感。

“当中国在东南沿海一带的社会经济结构逐渐为现代化生产、商业所代替的时候,这巨大而复杂的生活内容,就提供了文学形式相应改变的可能性,茅盾的贡献之一便是适应了30年代生活的变化,对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文体作了新的拓展,向中长篇延伸,大大提高了中国现代小说反映生活和人的心灵深广度的可能性。”^[6]²²⁴茅盾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子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小说中的民族资本家吴荪甫正是基于嘉兴地域商业文化的商人形象。茅盾在《子夜》中将主人公吴荪甫的故乡命名为“双桥镇”,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其所具有的人文特点都具有茅盾所熟知的故乡——乌镇的影子。《子夜》描写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城镇经济状态的真实图景。小说主人公吴荪甫利用家乡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充分发展小城镇商业经济,他投下巨资,使家乡日渐趋向现代化。小说通过描述双桥镇的经济结构为读者勾勒出了在大上海的宏观经济背景下江南小镇经济的侧面图景。从地理位置而言,嘉兴经济地理环境与上海相依相附,20世纪初的上海在通商和新产业的社会需要下,形成了新型的经济发展空间,构成了丰富而多样的社会阶层,如买办阶层的形成等,嘉兴地域的经济发展不免也受到上海经济因素的调控与影响,而这种调控与影响是以作家茅盾“走出去”的形式来实现的,即茅盾从嘉兴乡镇经济地理环境到上海都市商贸经济的变化,这种地理环境的转换对茅盾的经济视野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小说《子夜》中,公债投机、股票市场、托拉斯、信托公司等当时最时髦的西方经济术语层出不穷,这些无不体现出作家所处经济地理环境的复杂性。从人物形象方面来看,茅盾塑造的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形象仍然来源于茅盾在生活环境中所接触的工商业者的圈子,吴荪甫的人物原型就是他的表叔卢学溥。而卢学溥也出生于乌镇的一个富绅之家。他崇尚维新,无心进仕,一心致力于银行业。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指出,《子夜》主人公吴荪甫的性格特点一部分取之于对卢学溥的观察,一部分取之于他从事工商业的同乡。茅盾在《子夜》中用一种缜密的经济角度去分析展示了当时的社会问题与经济价值,小说的经济视角使其与同时代的海派作家们拉开了距离,茅盾的创作也被称为是“最具生产力意义”“最具产业意识和金融意识的作家”^[10]。

茅盾的小说创作注重从经济视角剖析社会,从而揭示了受经济条件所支配的人的社会心理和情境,这种经济视角的观察与思考都与茅盾身处的经济文化环境息息相关。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茅盾小说中的经济因素真实地再现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江南乡镇的经济文化环境。

三、茅盾小说创作中的文化地理符号

茅盾的小说创作中,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抑或是民风尚俗,都是嘉兴文化地理的象征符号,他的创作体现了作家对嘉兴文化地理的高度认同感。

在茅盾小说中描写的自然景观具有典型的江南地理特征,如小说对“雨”不厌其烦的描述,从细雨到暴雨,多次交替出现,而且这种自然景观的描写往往与小说中主人公的心绪紧紧相连。当林老板处境糟糕时,“天又索索地下起冻雨来了。一条街上冷清清地简直没有人行”。^{[9]107}雨水的萧瑟仿佛在诉说悲伤的心情,渲染了更加凄凉的气氛。很显然,在这里作为自然景观的“雨”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雨”给小说中的主人公带来的是凄凉与无助之感。在《子夜》中,当吴荪甫的妹妹惠芳终于抛下老爷的《太上感应篇》去玩时,“雨越下越大,东风很劲,雨点簌簌地直洒进那窗洞;窗前桌子上那部名贵的《太上感应篇》浸透了雨水……”^[11]文中的“雨”不仅洗去了《太上感应篇》为代表的旧时代,而且暗示着主人公吴荪甫即将迎来商场上的急风骤雨。在茅盾小说中,“雨”不仅仅是江南的自然景观,更是一种社会环境的象征,是与小说人物相对应的社会实景。

建筑景观作为一个地区的人文景观,代表了一个地区的文化符号,而一个地区的建筑气质可以呈现出这个地区景观文化的内涵和特点。茅盾的生长地——乌镇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古镇,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吴越春秋时期,小河两岸是乌檐青瓦,沿河的小船在一个个桥洞下穿过,形成了独特的桥文化与船文化。在茅盾的小说中,有很多对桥和船的描写,他多次以乌镇为蓝本,描绘家乡的建筑景观。如小说《林家铺子》中描写了沿街商铺毗连,商铺的建筑体像水墨画般与河相邻,这种建筑景观正是乌镇的真实面貌。乌镇石板路的两侧民居与商铺沿街而排,古朴飘逸的建筑风格是嘉兴居民生活环境的缩影,林家铺子已成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标景观,其景观的文化意蕴也隐含在乌镇的空间形式中。正如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所言:“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12]

风俗习尚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反映了地方特定的生活形态和民风民情。嘉兴地区自古以来就风俗丰富,茅盾成长于这样的民俗形态环境中,耳濡目染,不免在作品中对江南的民俗世相有着生动的描述。最典型的是茅盾小说《春蚕》描述的蚕桑生产习俗,“用中国传统的方法来殖蚕,是一个古老而粗陋的方法,需要爱心、忍耐和虔诚。整个过程就像一个宗教仪式”。小说描写了民间蚕桑的各类风俗:老通宝通过大蒜头上长出的绿叶多寡来占卜春蚕的收成;四大娘淘米烧饭时观察饭锅上的热气有没有直冲上来,热气冲得越猛,则预示着蚕花越好。这些描写,不仅使读者了解了中国传统的殖蚕方法,而且如实地反映出嘉兴地区的民俗风尚,让读者感受到江南蚕事活动的氛围。从某种程度而言,嘉兴地区特定的风俗文化已经浸润到了茅盾的创作思维中,这种地域文化精神的影响和规约对作家的创作心理趋向是无形的,也是深刻的。

总之,茅盾小说通过对嘉兴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相关描述,为读者提供了感性的地方性体验。茅盾故乡的文化地理因素在小说中已经内化为一种文化符号,成为嘉兴地区的具象表述与象征。

一个作家个体的生活环境与文化心理,足以折射出他生长的文化地理环境特征。小说作为文学创作的形式,是反映一个地区地理性的文本。茅盾的小说创作,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作家故乡的地理文化特质对其小说创作的浸染与影响,他以人们便于理解的方式反映了故乡嘉兴地区的文化地理。在嘉兴文化地理的语境下,分析茅盾小说的空间建构和人文地理因素,不仅使读者能够通过作品认识嘉兴地区的文化地理面貌,更能使读者深刻理解作家的文化品格。

参考文献:

-
- [1] 曾大兴. 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5:501-505.
- [2] 周晓琳, 刘玉平. 空间与审美——文化地理视域中的中国古代文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181.
- [3] 王德威. 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50-51.
- [4] 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 [5] 马立安·嘎利克. 茅盾的《林家铺子》及其短篇小说[M] // 茅盾研究:1辑.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4:303.
- [6] 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222.
- [7] 茅盾. 我的家庭与亲人:上[M] // 孙中田, 查国华. 茅盾研究资料(中):茅盾回忆录.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88-89.
- [8] 茅盾. 茅盾选集:中[M]. 北京:中国出版集团,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177.
- [9] 茅盾. 林家铺子[M] // 茅盾小说.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6.
- [10] 王嘉良. 茅盾创作:经济学视角及其意义[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2(3):86-92.
- [11] 茅盾. 子夜[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548.
- [12] 迈克·克朗. 文化地理学[M]. 杨淑华, 宋慧敏, 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40.